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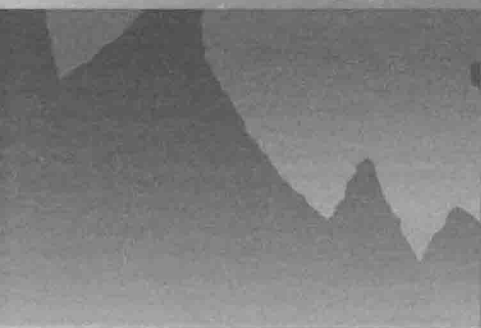
● 崔济哲

旧曲新歌

JIUQUXINGE

● 新华出版社

● 崔济哲



新华出版社

旧曲新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曲新歌/崔济哲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3
ISBN 7—5011—3930—X

I. 旧… II. 崔…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074 号

旧曲新歌

崔济哲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

新华书店 经销

太原市南郊昌宏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 插页 31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7—5011—3930—X/G · 1442 定价: 18.80 元

走向记者之路

代 序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1982年开始的。

三十多年前，正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不知天高地厚的岁龄。也曾学着伟人挥斥方遒，指点江山，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用当时的一句流行术语说，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七彩的梦，五花的路，上天入地，出将入相，好象从未想过、梦过、眼馋过新闻工作。从彩环闪烁的亮度上看，新闻工作在一名北京中学生心目中，光辉度似乎不如曾梦寐过的文武二道。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平静幸福充满天真幻想的生活，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短暂，似乎还是那么模糊。因为紧跟着1966年就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该如何去评价文革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见仁见智者甚多，论文专著也不少。就我个人实事求是地说，没有那苦难艰辛的插队生活，没有那晋西北黄土地上六年漫长的考验与磨炼，没有以后四年在一家县办纺织厂三班倒的挡车工生涯的淬火锻造，我都有可能路歧在它。插队六年，我光头剃了六载，海底胡蓄了六年，以至那年军宣队到村后说我们这批北京老插剃头蓄须是对社会不满的极度发泄。但我可以无愧地说，那六年农村的苦辣酸甜，那特殊年代中的每堂生动具体而又近乎残酷的阶级教育课，贫下中农的深情厚意和农村淳厚感人的风俗民情，都深深印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和我插队的那乡那村，那土那石，那院那屋，那朝夕相处、苦难相同的患难之友，至今仍感

到那么亲，那么近，那么和谐温馨。人生难得那么一段当时令人难熬过后令人难忘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在那个年代，个人的自主能力如同狂风之下的黄叶。就人生的机遇而言，如果给它一条石缝，他能长出一片绿叶。我却没有，连一条窄窄的石缝岩隙也没有。否则，我真可能成为一名作家，很可能出一些令人掐人中甩眼泪充满喜怒哀乐的人生戏剧。我刚刚从事新闻工作时，正血气方刚，用一句组织上选拔干部的政治术语讲正年富力强。按捺不住迁客骚人的冲动，提笔写过几篇小说，看过的人还都啧啧赞赏。所以我自信和我同时代的诗人墨客相比，我有着和他们相同的经历，又有着比他们更丰富的生活。源头之活水，长青之绿树，还是可以自豪一点的。但没有，那个时代不会青睐像我这个被称之为“深深打着阶级烙印”的人。我一生难忘我在江西分宜父亲所在的“五七”干校劳动时，因思想活跃，评天论地，那个空军派来的军代表，那副市侩流氓的嘴脸腔调：“有无产阶级专政在，你们这些人休想翻天。”本来听说当时是有政策的，像我们这些北京老插是可以随父母去“五七”干校，把挣工分吃口粮改为挣工资吃皇粮，但那位军代表说这些农村来的家伙不好整，调来会出问题，又把我们统统撵回到晋西北农村。几次上调招工的机会，几次都失之交臂。我那个村全村一百多个北京知识青年，到六年头上走得只剩下我们三两个人了。我认命了，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身上穿的是老乡用分给我的棉花在自家的织布机上织出来的家织布，买包藏青的染料一煮，春华秋实黑粗布衣裤。入冬进九穿的是捻边肥裆棉裤，脚上登的是老乡给做的千层底老虎鞋，睡的是和老乡一条大火炕，吃的是和房东一个锅里的豆散散，抽的是地地道道的小兰花。如果有人不嫌弃的话，再娶个当地的农村姑娘当媳妇，土里刨食，了此一生。老房东就曾给我张罗着说过媒。条件只有一个，让我留下头发剃光胡子。否则没有姑娘愿嫁给一个和尚头。环境改造人，

社会改造人，人最能改造人。凡经历过来的人，没人不信那句话，不服不行。这时候再也没有什么想入非非了，再也不会有什么雄心壮志了，更不会再有什么七彩的梦、五花的路了。这时候才明白了一个真理，揪着头发是离不开地球的。阿基米德定律是万能的，双手力再大也拉不开马德堡半球。

据说，当时许多北京知青的父母每每到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去“玩儿命”，最终闹出了点儿名堂，北京要求各地把还在农村插队的北京知青尽快安排工作。鬼使神差又让我走进了一家县办工厂，三班倒，当织布车间的挡车工。一个月挣16元钱。第一个月发工资，乐得我上县百货公司买回四个玻璃瓶装的上面半截凝成白油的猪肉罐头，打回一斤一毛三一两的粮食白酒，真正过了把瘾，也才真正体会到农民老二哥和工人老大哥的区别，体会到吃皇粮拿工资的优越性。我在农村受的苦、经的罪、出的力比在这个小小的纺织厂要多十几倍几十倍。但投入和产出却成反比。最惨的一年，年底才分了54元，其中还只能兑现一半。才懂得当时的农民对挣工资的人为什么看得那么神圣伟大，天天梦想着鲤鱼跳龙门也能当个工人。当工人少多了。我当时十分自信，自以为天资不错，也的确才用了三个多月，便把什么操作法、巡回法全弄懂弄通弄精了，还结合本车位、本织机的性能自己发明了一套又省力又省时又实用的办法。别人看四台织布机，我开六台，还常常轻松潇洒地吹着口哨找人聊天。在工厂，吃饭有食堂，睡觉有宿舍，洗澡有澡堂，到月就关饷，除8个小时上班，加上班前会、班后政治学习，10个小时以外都是自己的时间。知识分子的天性，我又开始读书，常常一读半夜，有时下了中班回到宿舍11点，一直读书读到同屋的工友早班去上班，也就是清晨5点钟。因为那个时候宿舍常常停电，只好点用墨水瓶装的小煤油灯，一夜熏得两个鼻孔下像长了日本仁丹胡，说话都带股煤油味，吐口唾沫，总是挂着几缕淡淡的黑丝，像刚出窑的煤黑子。总务科还总不依不

饶地批评，你是点灯油还是喝灯油？然而，我也正得益于这段秉烛达旦，夜读杂书，方知天外有天，世界之大；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那年月，头一年一个月挣16元，第二年涨到18元。据说是从棉纺系统工资序列最低一档开始爬起。虽然一个月的血汗钱不够两个指头使劲捻两下的，但像我这个从广阔天地来的农民已如进天堂。因此在工厂那几年月月红旗，年年先进，虽然没有奖金，但亦足矣。曾得过被面、带笼屉的钢精锅等等，也够让一些人眼热，也够让一些人心气的。好的是，这些当时看上去用处不大的名誉奖品，以后都成了我娶亲成家的战备品。为了纪念这段日子，我曾经很长一段时期不愿把已经很破旧的这套家什替换掉。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岁月刻在脸上，情感印在心中。那时候很多和我同时上调进厂的知青都笑我痴、傻，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找事干。三餐一倒，过一天痛快两晌。我也不是玩深沉不是有什么先知先觉，只觉得无聊，10个小时之外有一种无可言明的烦闷状。钻入牛角尖，才知除去酒里乾坤大，还有书中日月长。如果说我以后能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全国名牌大学南开大学是因为我有比较扎实的基础的话；那么，在工厂这几年没有虚度的光阴可以作证，天道酬勤。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江西“五七”干校陪老父老母受罪，没能赶上。我是从“五七”干校的广播中听到了，只觉得全身一振，似深夜见曙光，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几乎按捺不住。上大学是我的追求，向往，愿望。当时我非常认真地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清脆的播音，一字一句，听得那么认真仔细，深怕漏掉一个字、一句话。记得那天晚上，我兴奋地伏在父亲的耳根上尽力压低声音地说：“高考恢复了，我有希望有奔头了！”老爷子老练持重地无声笑了，又静静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因为整个仓库内睡着二十多人，其中不乏左得让人感到血淋淋的班排长。许久，父

亲推了我一把，悄声地叮嘱道：“报纸三天以后准到县城，到时候你想办法去一趟，买张报纸回来再研究一下。”随后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政策这东西怕变咧！”

父亲说话绝非空穴来风。

1973年是我在农村度过的第五个年头。先是花如雪，又是雪如花。从北京刚来农村栽下的几株小枣树，也早已是黄花落了结红果，转眼间长得拳头粗了。记得那年挂在灶房角角上的小喇叭响了，叫我们全体知青去大队部，说是先推荐后考试，考中的可上大学。那机会让人感到如在梦中，真好像应了那句略显粗俗的俚语，做梦娶媳妇。还真不是云山雾罩。那天天不亮就起了床，顶着星星上了路，趟滹沱河时天边才泛青。25里路一口气大步流星到县城。那是应试进考场，现在回过头来说那时的心情，已如秋后说初春了。当时真是道不尽说不完的兴奋、激动。考完一揭榜我高中全县前五名。当时前五名再没排状元、榜眼、探花什么的，但这已足矣。北京大学来的老师跟我见了面、谈了话。傻小子真要一步入天堂了。我赶忙跑到公社邮局给远在江西“五七”干校的父母拍了封电报，让双亲二老也高兴高兴。就等通知书办户口了，连粮食都卖了。在那种心情之下读杜老那首诗，才真正品出滋味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青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平地里杀出个白卷先生，真如三九天兜头被泼了一盆冰水。考试是资本主义复辟，考得越好，再教育越差。用我插队时的一句方言：“舌头长在他们的狗嘴里由他们搁搅哩！”那天躺在冰凉的土炕上，四两酒却醉了一夜半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又是水中月镜中花？

然而毕竟柳暗花明。中国，经历过无数苦难的中国在伟大的

邓小平老人家的力挽狂澜下，终于迈上了改革开放、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历程。改天换地恩泽于一代人几代人世代代的中国人。讲句掏心窝的话，一辈子不敢忘小平，一辈子不能忘小平。19年后，小平去世的第二天凌晨一点半，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打紧急电话，让我立即赶到省委18楼他的办公室，并没说什么事。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极不祥的预感。走进胡富国书记的办公室，胡书记坐在办公桌前正审阅中办的紧急电文，抬头看我一眼，我发现他眼睛红红的，还饱含着热泪，只对我说了一句：“你知道了吧，小平同志去世了！”又止不住热泪涌出眼眶。我先是一怔，继而只觉得一股热流冲上来，不知怎么的，再也压抑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继而呜咽起来。这绝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没有小平他老人家，没有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没有他老人家的方针、路线、政策，没有他老人家的伟大旗帜，我何有今天？想起父母在“文革”中、“五七”干校中受的苦难，想起自己孤孤单单一少年远离家乡，发配到晋西北农村当农民受的煎熬、磨难，那真是忆苦思甜，更觉小平他老人家恩情重如山深似海，岂能控制得住感情？为了开紧急会议，还是武正国秘书长劝住了我。当然这都是近20年后的后话了。

我们这些“文革”动乱中饱受苦难的家庭，从青少年就在战战兢兢中生活，就懂得了什么叫压抑和凌辱，双颊上就被刺上了无形的字。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狗崽子，对于个人来讲每一道罪名都不亚于一座肩负的大山。什么叫红色恐怖万岁，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什么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什么叫滚他妈的蛋，那可不是在黄土墙上刷一道风吹日晒的标语，那都是血淋淋的所谓“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是人斗人、人整人、人折磨人。在“五七”干校，我曾亲眼目睹了什么叫背对背揭发、面对面斗争，什么叫“温火煮牛头”，什么叫抓辫子、抓头发、抓头皮，什么叫“触及灵魂”。批斗一个人的母亲，逼着她的

儿女当面揭发；批斗一个人的父亲，逼着他的母亲在前面敲锣。我曾经看见一个只有一只手的老人拉着一辆水车爬坡。雨后的红土地，坡陡地滑车重，他几次拉上去又几次滑下来。我那时正像牛犊子浑身的劲儿没处使，就走过去帮他推了一把，老汉连话也没敢说一声，只是回过头来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连他是谁都不清楚，只知道他是给“五七”干校干部烧茶炉的。但却让站在远处看的军代表大为恼火，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又奈何不了我们这些被他称为“狗崽子”、“臭流氓”的老插知青，但他很懂得阶级斗争的艺术。刨树要刨根，刺人要刺心。他奈何不了儿子就折磨老子，除了在连队会上点名批判我父亲，还让他背上80斤重的糖包爬梯子，差点儿要了老爷子的命。当然这都仅仅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小镜头。

那些残酷的岁月，残忍的迫害，非人的待遇，没人愿意回忆它，但绝不应该忘记它。

走出那个时代的阴影，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新生的感觉。我们这些老三届的老插们多年后话当年时发自内心的感触都是翻身不忘邓小平，幸福牢记邓小平。应该讲，我们这茬人对小平他老人家是有感情的，是真正感到他老人家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的。没有他老人家，进高等学府的大门，我们连想也不敢想。

1978年夏天，我终于圆了大学梦，跨进了南开校园。由史称“老三届”变成了“新三级”，即插队时的六六、六七、六八届老插，变为七七、七八、七九级恢复高考后的新大学生。在我们新三级里有一句名言，是套前苏联那个很有名的电影《难忘的1919》而来的叫“难忘的1979”。那时候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人们的思想极其活跃，尤其是我们这些老三届都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最基层来的，每个人都有一番苦难的经历。那经历可能够不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但谓之五千里短征是绰绰有余了。

1978年时，大地尚未开冻，“两个凡是”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我的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可能叫《结婚》，内容是一对新婚夫妻合百年之好，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纷纷送礼。那年头送什么呢？送毛主席像。结果一间小小的由单身宿舍临时改装成的新房中，从柜子到箱子桌子，从窗台到床头墙上，半身的整身的，站着的坐着的，无处不有，无所不在，毛主席的各种姿势的彩色挂像从四壁一直挂到屋顶，几百个像章又点缀在所剩无几的空间。所有的毛主席像章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注视着小小双人床上的一对新人，他们想躲也躲不了，想闪也闪不开。无所不在的领袖的眼睛时时刻刻眨都不眨地盯着这对新人的新婚之夜。睁开眼睛满眼尽是领袖，尽是领袖的眼睛；闭上眼睛竟也是领袖那慈祥伟大的脸。新娘害怕地叫新郎赶快拉灭灯。谁知道，送来的毛主席像和他老人家的像章很多都是用夜明材料做的，灯熄后才更显出熠熠发光，那笑脸，那双眼，那向前伸出的大手仿佛离新娘新郎更近了。新娘终于忍不住了，精神崩溃了，哭着叫着把那些像章都狠狠地打碎了。她疯了。这篇小说写得好不好已不是话题，关键是能不能这么写？该不该这么写？这么写是什么用意？该不该追查一家伙？等等。如石击清波，水入沸油，记得立时就分成两派，先还论，继而辩，后而争。那个时候的思想真够解放的了。争论范围也越来越大，终于冲到了一个个禁区。我的寝室住七个人，有的同学就叫了真，在说到是非标准时，马上有人接腔，说难道彭德怀、刘少奇也可以平反吗？立刻有人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错了就该平，不管谁定的案谁拍的板。又有人接上：“那么布哈林、托洛斯基也能平反啦？”马上又有人答道：“为什么就不能平反呢？谁知道什么时候就平了反呢？”有时候往往一争就争到深夜。有时急了，也搞点人身攻击，自认为持有真理占有正统的人就说，你们这样说比五七年右派还右派，比七五年翻案还翻案。但我们这些人毕竟是经过阶级斗争考验的人。和我同睡下铺的一位江苏籍同学说：“‘文

革’中说我反军，我死也死过几回，坐闷子车从江苏氓流到新疆，独身一人下天山，不用说右派翻案，何惧之有？不恭维地发展套用一句伟大的语录‘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帽子吗？’”总之，那时候真叫思想活跃，都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变革在所难免。15年后，在毕业十五载重聚南开母校时，我们相聚一场还都谈起当时的争论，都哈哈仰天大笑。很多同学都已变成全国小有名气的评论家、作家、学者、专家……

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可以自豪地面对苍天厚土说，我没有虚度大学光阴。曾有幸荣获南开大学首届奖学金，是学校领导亲自给我颁的奖。一张证书，一个红包，50元人民币，那时我一个月生活费才20元，双手托着50元真是沉甸甸的。我拿出其中的20元请全中文系的同学看了一场电影，请本宿舍的六个弟兄喝了一顿酒，最好的酒菜就是用洗脚盆放在电炉子上炖的一副羊下水。

大学毕业离校那天正值蒙蒙细雨，大家洒泪而别，因为车次等等原因，有的同学竟没能来得及话别就招招手匆匆而别。谁知这真如古人所言分别时难见亦难，再见时竟是十五载以后。手拉着手，无言的笑，无言的泪，同学之情真是难得。

如果说三十多岁才大学刚刚毕业，我们那些老三届的插友们还以大器晚成在互相自我勉励的话；那么，32岁才跨进新闻界的门槛，去当一名刚刚学步的小记者确有一种“廉颇老矣”的愧疚之感，也就更激发了像我们这茬在广阔天地一插就是十年八年的老三届们以还我青春为源的拼搏之力。

我记者生涯的第一场严峻考验就是在曾有“洪洞县里没好人”之称的大槐树下。1985年，国家重点工程南同蒲铁路复线由北向南穿洪洞而过，这就引发了当地一些农民，甚至是一些乡、村干部明里暗里带头敲国家重点工程的竹杠，使国家重点工程屡屡受挫。其心肠之黑，手段之毒，办法之多，地头蛇的招数之妙，都

是在我深入采访后才领略其中一二的。我写的数篇内参因此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重视，新华社配发的评论“不许敲国家重点工程竹杠”成为当时舆论的中心，由此各地都纷纷整肃国家重点工程的施工环境。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在中央和各地党委直接关心下，一些坏人受到法律的严惩，国家重点工程得以顺利进行。风起于青萍之末，不许敲国家重点工程竹杠的舆论兴起，我是始作俑者之一。

而在这场艰辛充满曲折危险的新闻调查中第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就是以后赫赫有名的刘郁瑞，山西很有才干的青年作家张平写的《天网》中的主人翁。刘郁瑞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听完我的话沉沉稳稳地笑笑，又绷紧面皮十分严肃地说：“不会吧？昨天县里开会我才表扬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很不错的！要在县里投资办一个冷库，再建一个洗澡堂，群众很拥护啊！你们上边下来的人要体谅我们基层干部的苦处，不干工作批你是老好人，干了工作就得罪人，黑帖告你是罪人，整不倒你也叫你没脸见人。”刘书记讲话很有深度，也很能挥洒得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近及远，我听得十分明白，后生家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当时我就看得十分清楚，过后我也得到过证实，老刘那时确实确实小看了他眼前这个操着一口京腔的小记者。当记者的，敬酒能喝，罚酒也要敢喝。至今我还这样认为。老刘当时没有相出面来，这白脸后生娃在晋西北贫瘠的黄土地上土里刨食苦苦煎熬了整整10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与贫下中农三同的时间比他还要长。吃的苦、受的罪、挨的骂、遭的难比他这个土生土长的洪洞汉也不少。比起他的部下有意无意地制造的小难题、小障碍、小圈套，岂可同日而语。10元钱押金借了一副里外铁硬早已分不出本色来的铺盖，5毛钱搭上了去那个敲国家重点工程竹杠村的一辆吐吐直冒黑烟的小四轮。现在不再去说那个村姓李的支部书记坏到什么程度，睡别人的新媳妇比睡自家媳妇还有理，殴打村民比踢路中央一只狗

还随便，花公家的钱比倒洗脸水还痛快，逼一家人能把人逼得一家老小多半不敢露面。敲国家重点工程竹杠，可以说心黑手辣。一口废机井，开价20万，一抱拇指粗细的小树枝往地里一插，按5块钱一根计价，一条搓板土路借用一下，买路钱10万，一个造价不过5万元的小灌溉站李书记指头一竖，100万，少给一个钢镚儿也不干！否则，村里七老八十的敢死队“自愿”往放炮起爆点席地而坐，年轻人更厉害，干脆拔掉导火索，向雷管上大小便。施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着急吐唾沫，只要你动一指头，今天就可能出人命。一条人命值多少钱在重点工程赔偿费的补贴政策条文中没有，但李书记处理这类事可会掌握“分寸”。

李书记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同样不怎么尿，铁道兵的师长团长他都不尿，用他的话说，“还想捅我？看他能尿几丈！”负责接待我的那位自称是副书记的人，极像曹禺先生笔下的鲁贵，很殷勤和蔼地把我领到一间低矮废弃的窑洞中，里面有一张旧木板床。我刚在床板上坐下，试着想清理一下，立即发现床板缝里一群群臭虫像暴风雨前蚂蚁搬家，匆匆忙忙地来回爬着。那位自称是管外事的副书记表现出极不好意思但又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检讨：“记者同志，咱村实在穷，条件太差，这地方真不好意思叫您住，要不，还是送您回县里吧！拖拉机现成的，绝误不了您回县城吃晚饭。”那人那语至今令我如忆昨事。我把当时的采访笔记翻出来了，不妨抄几段以示当时的那情那景：幸亏我有六个春秋的“插龄”，晋西北农村中经过见过听过的邪事歪事黑事白事不见得比这位晋南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少多少。我从场上抱来麦秸，把床拉到院里，把麦秸放在床下面，点着火，自己叼着一支香烟饶有兴趣地看着烟熏火葬的壮观现场。成排的臭虫从床板上纷纷翻滚到烟火中，发出啪啪的声响。我又拉着那位副书记绵绵的手到村支部借来一副喷雾器和一小瓶杀虫农药。说那个潮湿的小窑洞是个跳蚤王国一点也不过分，成群的跳蚤从脱了皮的墙

根上跳来蹦去，竟像扬起一片黑色的煤尘。李书记用心良苦，送不走你就逼走你，你要是真敢住下，用不了三天两后晌，不让臭虫跳蚤吃了你，也咬得你乖乖地滚蛋。

最令我难忘的是伙食，顿顿馍馍欠火候，上顿下顿又都是熬南瓜。我在那村里住了二十多天，吃了四十多顿熬南瓜，以至以后再也见不得熬南瓜，一见就感到胃抽搐。有一天记得吃得拉肚子，找到那位副书记想找点药，答复很明快，村里的赤脚医生十年前就嫁走了，要看病一去乡二去县。我还是坚守阵地，还是用我插队的老办法，每拉一次吃半头生蒜，硬靠大蒜止住了泻。

外出采访，后面总是跟着两个“尾巴”。夜里有人往窗子上扔石头撒沙土，有人在我住的窑洞上拼命跳，使劲跺，震得那间破旧窑洞的洞顶哗哗地往下掉沙土。终于有一天一个黑粗大后生喷着酒气，提着宰猪刀三分真醉七分佯醉，借酒撒疯地要找我评理算帐辩论……

二十多天的“白区作业”和“敌后”工作，终于摸清了李书记的“黑底”，近百万元的现金收入竟没有一本帐可查，全凭李书记二指宽的白条子任意支取，行贿、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当我回到县里，把在煤油灯下赶出来的稿子和厚厚一迭取证材料都交给县纪委一位副书记让他审阅时，那位两鬓霜白，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干部望着我失型蜡黄消瘦的脸，尤其是我浑身上下成片成片被跳蚤臭虫咬出的红肿的疙瘩时，心疼地用手颤巍巍地轻轻抚摸，两行老泪不禁潸然而下。

讲这些所谓过关斩将的往事，绝非卖弄什么英雄史，想要说的是记者之梦并非都是弥漫着紫罗兰清香的水晶世界。

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曾为自己编织过新闻记者的七彩梦。更多向往的是浪漫、诗意、现代、豪华、气派，就像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谈论战争。他们只看到让人羡慕赞美的金光闪闪的肩章、金星、功绶、勋带，却往往没有看见这五光十色、金光闪闪的荣誉、

地位、权威后面更多的是鲜血、白骨、死亡、呼喊、拼杀、搏斗，连那些九死一生的将军，那些炮火残酷吞噬下侥幸残存的幸运者都不敢、不愿去回首往事。我的一位忘年之交，一位曾经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兵，从来不看战争影片，他说，他不敢看。那就是战士的情怀，虽然他似乎还不如一名七八岁的儿童，因为乳牙稚子整天叫的喊的是看打仗的电影。

只有经历过的，才是可怕的。只有经历过的，才是刻骨铭心的。

1986年我和一名记者去上海采访，从北京坐特快去上海，在火车上遇上了列车服务员与乘客对骂以至搞得整个餐车内乱成一团。目睹列车服务员那种骄横野蛮粗鲁以势凌人欺侮乘客的丑恶现象，是热血男儿都会拍案而起，何况我们是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呢？于是一篇《文明列车不文明》的目击式新闻报道刊出，由它引起的后果教训，却是始料未及。原来那趟列车那个包乘组是铁道部树的连续10年的红旗单位，焉能被两个小记者放倒？于是立即组织了二十多人的专案调查组，取证，谈话，签字，画押，口径都一致，因为他们都像是文革中被批评的对象，都想竭力洗刷自己，更何况来了“娘家人”。似乎报道完全是虚假的、伪造的、有用意的等等。我刚从南方小分队采访回来，征尘未去，就被一道十万火急的金牌又推上二十几小时的火车，是作为“由原告变被告”推上被告席的。报道真实不真实，关键要找当事人。我们两个人在招待所对采访笔记，万幸，我们当记者的基本功还算扎实，按图索骥，竟找来够坐满一个小会议室的人。当时我心中真发怵发颤，如若找不到当时的乘客，那就是记者胡编乱造，克里空，有意诋毁，一场新闻官司就打大了，我们可能也就因此而不得不告别新闻这碗饭了。我们一家一家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还要拿着那天那趟火车票，所幸证人几乎都是因公出差，票据都在，单位亦可证明。那时的心情绝不是现在几句

话能说清楚的。最终三头对案，双方领导，在乘客一致作证的情况下，铁老大没人敢惹的国家权力垄断部门才在事实面前挤出点笑容，表示了退却，情愿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俩顶着星星踩着月光久久伫立在黄浦江边。当时如果稍稍一疏忽，笔头子稍稍一懒，人名地名厂名只要有一个不对，千万人的大上海哪儿去找证人？找不到证人人家焉能罢休？一想一身冷汗……

做一名新闻记者，一要吃亏，二要吃苦，三是要不怕死。否则就很难当一个好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攻占硫磺岛，在枪林弹雨中把星条旗奋力插在岛上，记录那动人心魄的一瞬间的新闻摄影就是新闻记者用生命换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年都有数十名新闻记者为新闻事业而牺牲。时代不同了，但那种拼搏敬业的精神永恒。钻在象牙塔里，泡在新闻发布会上是不会有出息的，只能是自毁青春。

我在山西当记者十几年，主要是搞工业报道，分工主要搞煤炭工业的报道。因此下矿井就是必修课。屈指算来，山西的大中小煤矿也下过几十座。现在回想起来，下矿井最难的，是除夕下井。80年代中期，国家缺煤缺得厉害，因此对煤炭生产、煤矿工人的报道份量就特别重。煤矿工人春节不但不能休息，而且还要搞“高产迎新春”，我们当记者的当然也就不能在家团聚。我曾经连续四年没在家中过过除夕。老婆、孩子的工作还好做，咬咬牙，横横心，一跺脚就走了，在七十多岁的老父老母面前就硬不下心来了。那年，西山矿务局杜儿坪矿刚刚发生了瓦斯爆炸。父母都不放心，年近八旬的老父亲从来不拉我的后腿，那次却一再说，我老了，你兄弟姐妹从北京专门赶来过春节，一家人难得在除夕聚一聚，能不能跟领导说说，请个假？满头银丝的老母亲拉着我的手，老泪潸潸，说：“儿啊，别走了，妈这几天老做恶梦，大年里谁不在家团聚团聚？你去了煤矿，当爹当妈的心里能安生？”我感到，泪就在眼眶里含着。女儿这时也扑到怀里，哭着喊着搂着我